

描述性范式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研究

安 爽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济南 250358)

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文化转向”的热潮, 具有革新性质的描述性范式在批判传统规约式范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本文以描述性范式为依托, 从时代背景、译者主体及赞助者三个层面分析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成功译介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 “五四”时期特殊的文化政治环境、赵元任语言学家、音乐家、“儿童观”译者的三重身份及商务印书馆的传播发行三方形成合力, 助推了这部作品的成功译介。

关键词: 描述性范式;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时代背景; 译者身份; 赞助者

中图分类号: I046; I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2) 01-0027-07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01-027.html>

引言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作者为路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此书第一版于 1865 年出版。赵元任先生在 1921 年将其译为中文版《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并于次年 1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该部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这部童书后来又有多个译本, 但其产生的影响力却远不如赵译本, 这与译者本身的经历与翻译观紧密相关。

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已有百年, 期间不仅得到了普通读者的好评, 也收获了相关学者的赞誉。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活泼有趣, 富于韵律, 儿童本身具有独特而强烈的审美意识。目前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仍以规约性研究范式为主, 多采用译本对比的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不够客观。描述性范式则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因素,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客观的视野。鉴于此, 本文以描述性范式为框架, 聚焦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时代背景、译者主体及赞助者因素, 探寻这部译作广受好评的深层次原因。

一、描述性研究范式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描述性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传统规约性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它将研究视角从文本内解放出来, 从而转向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文学翻译的研究模式尤其需要在描述性研究的框架内进行, 因为离开特定的社会语境仅仅探讨译文优劣易趋于静态化、片面化、主观化。在目前的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较少见到描述性

范式的身影。在实践层面, 由于经济效益与出版机构的支持, 我国儿童文学译本层出不穷; 而在研究层面, 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的高水平论文与专著却寥若晨星; 研究对象呈现聚焦于文本内部的倾向。

(一) 描述性研究范式的发展概况

有关描述性翻译范式的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953 年, John McFarlane 发表了《翻译的模式》(Modes of Translation), 在这篇文章中, 他“以一种描述性的范式对传统设想进行激烈的反驳”。20 世纪 60 年代, 列维 (J ĭ v í Levy)、波波维奇 (Anton Popovic) 与左哈尔 (Itamar Even-Zohar) 等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 左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观为描述性翻译框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描述性翻译学的著作, 如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图里 (Gideon Toury) 的《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80) 及玛丽·斯内尔·霍恩比 (Mary Snell Hornby) 的《翻译研究: 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988) 等; 除此之外, 1989 年图里 (Gideon Toury) 与兰伯特 (Jos é Lambert) 创办了杂志 Target, 该杂志虽未表明与哪一学派相连, 但其研究方向聚焦于理论与描述研究以及将翻译“语境化” (contextualize), “后 Target 成为描述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国际比较文学协

会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围绕翻译文学召开了三次研讨会, 分别在鲁汶 (Leuven, 1976)、特拉维夫 (Tel Aviv, 1978) 和安特卫普 (Antwerp, 1980), 会议的文集名为《文学操纵: 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因此文集的撰稿人被称为“操纵学派 (Manipulation School)”。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的到来, 描述性研究进入到更为完善的阶段。“文化转向”一词源自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在此书中, 他们认为应该将翻译置于文化、政治等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吉迪恩·图里在詹姆斯·霍姆斯与左哈尔翻译理论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描述性翻译理论, 他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1995) 中提出了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探讨了描述性范式的应用及翻译规范。

描述性研究翻译研究并未就此止步。赫曼斯 (Hermans)、勒菲弗尔等学者仍致力于这一领域, 阐发了更为完善的描述性研究观点。如勒菲弗尔摆脱了多元系统的限制, 开始思考意识形态 (ideology) 和诗学 (poetics) 在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作用。

传统译论大多过于强调原作, 将“忠实”奉为主臬。描述性研究正是在超越传统规约性范式的研究下成长起来的,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全面的视野。描述性研究不再囿于文本内部, 而是将翻译语境化、将翻译置于目的语的背景下进行探讨, 从而揭示翻译行为的深层次缘由及翻译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图里提出: “在我看来, 任何翻译都不能完全脱离其所处的历史地位而进行阐释”。一直有学者积极将描述性范式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 可“国内目前对此理论的研究稍显不足” (应承霏, 2015), 尤其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较少见到描述性范式的身影。鉴于此, 本文依据描述性范式, 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翻译过程及传播发行情况中进行研究, 以期对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二) 描述性研究范式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

近五年 (2017~2022) CNKI 的核心期刊上仅刊登

有 16 篇有关儿童文学翻译的文章, 且有关该领域的研究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权威翻译期刊《中国翻译》上仅刊登了 3 篇, 如徐德荣、姜泽珣 (2018) 讨论了以源语为导向的对源文本风格的传达与再造。吴术驰 (2019) 采用了译本对比分析的方法, 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探讨了语意逻辑在词意选择、句意分析及内涵理解等方面的作用。二人的研究皆属于规约性研究范式, “其主要特点是关注文本对照, 力图探索语言转换的规律, 评判译文的优劣。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比较明确, 从研究尺度上看, 属于较微观的研究。”但在检索到的 16 篇论文中, 笔者发现有学者从“开明书店”“出版机构”等角度研究儿童文学翻译, 说明国内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已经呈现转向文本外因素研究的趋势。

有关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著作虽所产不多, 但涵盖面较广。笔者结合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的馆藏记录情况, 发现从 2017 年至 2022 年 3 月国内共出版了 8 部相关著作, 其中儿童文学文体学研究 1 部、儿童文学综述类研究 4 部、儿童文学翻译家研究 2 部、儿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1 部。

近五年 (2017~2022) Web of Science 中有关儿童文学翻译的论文共发表了 139 篇。其中, 2017 年共发表了 24 篇; 2018 年 23 篇; 2019 年 32 篇; 2020 年 29 篇; 2021 年 22 篇; 2022 年截至 3 月共发表了 9 篇。2017~2019 年间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 在 2019 年之后发文量逐渐减少, 但差别不大。说明近五年来国外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较为稳定, 一直有学者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在研究层面, 涉及文本外层与文本内层面的研究皆有。

从研究层面上看, 我国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以讨论译文的优劣; 或探讨某种翻译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属于文本内部因素的研究。国外关于文本内部及文本外部的因素皆有所讨论。文本内部因素的研究过程及方法趋于静态化、局限化, 明晰了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 而对于为何会使用此种策略或译者为何会有此翻译思想却语焉不详。

综合笔者的调查研究, 发现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目前我国面临两个困境: 其一, 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深度与广度都有限, 大多数研究仅从译本对

比的角度分析译文的优劣,讨论局限于文本内部,不够客观;其二,针对儿童文学翻译领域的研究人员太少。这两个困境与儿童文学翻译领域边缘化的现实密不可分。戏剧翻译在国内译界也处于边缘位置,但二者未受到重视的原因却恰恰相反,戏剧翻译是因其“复杂”,而儿童文学翻译是因其“简单”。但“儿童文学的翻译貌似简单,实非易事。儿童文学中的语体和童趣等都是十分微妙的问题,需要译者有敏感的文体意识,敏锐的语言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实现译作与原作的功能对等”。(徐德荣,2004)

笔者并非特意强调从文本内部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翻译有诸多弊病,相反,此种研究对于指导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大有裨益。只是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去考察译者翻译技巧的应用或评判译文的优劣,这样的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不够客观。钟毅等(2017)指出,“没有翻译,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晚清以降的西学译介高潮”。中国本土的儿童文学发展史与儿童翻译文学史密不可分,只有将译本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中才能获得较为客观的研究视野。

二、描述性范式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历程与特征

从文本外的因素来看,译本的诞生主要受到时代背景、译者及出版商三方的影响。其中时代背景贯穿翻译活动的始末,隐性而又深远地影响着源文本的选择与译介效果;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学术经历与翻译素养决定着译作的质量;而赞助者为译本诞生前的最后一环,在平衡译作学术性与市场性的基础上促进译作的传播与发行。

(一)时代背景——“五四”时期下的翻译

描述性研究区别于规约性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更多地考虑权力、文化、经济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描写翻译学派的兴趣不在语言上,它试图探讨翻译的起因以及翻译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林克难,2001)

中国在20世纪初,政治上朝代更迭、军阀割据,后辛亥革命爆发、一战爆发,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以笔为戎带领国家寻找光明,其中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他们开始探索“学术救国”的问题,其文学或翻译活动是为了满足“开

启民智”的政治诉求,所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语言上,为了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桎梏,白话文运动及文字革新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思想上,随着卢梭的《爱弥儿》及杜威教育思想的引介,传统的“君臣父子”“成人本位”的观念逐渐得到转变,儿童教育及“儿童的发现”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此时期,周作人先生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920年,他在《儿童文学小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儿童的文学”,使儿童文学逐渐从庞大的文学领域中独立出来。

“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翻译令国人意识到儿童文学可以承载政治使命,具有民主启蒙的功用”。(李文娜、朱建平,2015)

1910年7月,赵元任参加了第二批庚款赴美留学活动。留学期间他在康奈尔大学与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了哲学、心理学、音乐等多门学科,且都有所成,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对他日后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赵元任留学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清政府将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用于兴建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思想。在此背景下,赵元任先生得以走出国门、开拓研究视野。1920年8月,赵元任先生回国,并于1921年1月开始翻译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在赵元任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新诗学构建的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始终“在场”。赵元任与胡适私交甚好,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妻子杨步伟结婚时,他们只请了胡适和朱征二人作证婚人(值得一提的是,《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译者序》是赵元任在新婚这日写的,可见这部童书在他心中的分量)。胡适也曾回忆道:(赵元任,2017)“赵元任常到我家,长谈音韵学和语文罗马化的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胡适通过自己与商务印书的关系,推荐赵元任参加该馆的国语教材活动。赵元任完成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翻译之后,便交予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1月出版了;且《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由胡适命名的。由此可以看出,赵元任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更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与其他学者共同完成的一场语言改革试验,他个人也将其称为“评判语体文”成败之作。

通过回顾赵元任先生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

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他此次翻译活动具有双重先进性:一是摆脱传统语言学对科学思想的束缚;二是摆脱“成人本位”思想对儿童的束缚。

(二) 译者主体——赵元任的翻译缘由与翻译观

译者是翻译活动主体,在其“所处的时代中必然要受到主流诗学(poetics)与意识形态(ideology)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非意味着译者的“隐身”,译者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可以对源语进行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语习惯,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

1. 翻译缘由

赵元任选择翻译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兴趣使然。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扉页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言外之意即此书的受众不止儿童,也侧面说明了他对这部作品的肯定。他也会亲笔谈过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喜爱:“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教科书,并制作一套国语留声片,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是我的处女作,由胡适命的名,1922年在上海出版”。(赵元任,1997)

除此之外,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中国语言改革的需要。他致力于汉字改革工作,鼓励民众摆脱文言文的桎梏,使用白话文。赵元任倡导“汉字罗马化”。所以为了将理论融于实践,他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凡例》中,用了11页的内容讲了注音字母的读音拼法、标点符号等。如:ㄅ、ㄆ、ㄇ、ㄋ,且在译文中使用了注音字母。如下例:

例1: (In which the cook and the baby joined):

‘Wow!wow!wow!’

合唱(那个厨老妈子和小孩子亦跟着唱)

ㄨㄠ!ㄨㄠ!ㄨㄠ!(赵元任,1922)

2. 赵元任“儿童本位”的翻译观

赵元任是中国20世纪初一位伟大的学者,他学贯中西,在语言学、音乐学等多个学科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赵元任对语言及其韵律具有敏锐的意识,更对儿童教育问题有独特的见解。赵元任与妻子杨步伟一生

育有四个女儿,从他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可窥探出其儿童观。他对孩子的教育倾向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而非传统的“私塾式”或“惩戒式”教育。他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让儿童在轻松活泼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也注重儿童的音乐教育。其妻杨步伟曾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中描述赵元任教大女儿赵如兰弹钢琴的情景,

“元任一面弹她就一面哼一面摇……他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并且说好了孩子的杂事是归他管的”。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也曾曾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从小也常一起唱歌,有时父亲伴奏……他很少对我们训话,总婉转地引导我们学东西。”从赵元任的家庭教育观中可看出他尊重儿童心理与生活,而“‘尊重儿童’是现代儿童观的前提”。在翻译实践中他也心怀儿童,而非将儿童“矮小化”;其译笔不仅流畅,而且体现出了儿童的趣味性与审美情趣。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含有大量的双关语与诗歌,这是这部文学儿童作品的一大显著特点;对于译者而言,其中双关语与诗歌的“音”与“义”的取舍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思果在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进行评介时便表示:“这是一本‘不可译’的书。原书的俏皮之处,仿前人作品的歪诗,可以说不能译”。但正是因为文本中大量的双关语与打油诗才让这本书成了一部“笑话书”,给儿童读者带来语言的乐趣。

例2:

“I have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let me help to undo it!” (Carroll, 1901)

那老鼠很凶很怒道,“我没有到!”

阿丽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罢!(阿丽思说着四面瞧瞧,因为她很喜欢帮人家的忙)(赵元任,1922)

原文中的“not”和“knot”构成双关,赵元任先生为保留效果,将其处理为了汉语中的“到”与“刀”,虽在意思上相去甚远,但却获得了与原文相近的艺术效果,保持了趣味性;且使故事上下连贯,无唐突破碎感。倘若选择忠实于原文内容译为“一个结”,那才会残酷

剥夺儿童读者的阅读兴味。“我们可以说，这体现了译者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重视译文可接受性的等效翻译观，这是一种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徐德荣、江建利，2012）

音乐性是诗歌的最大特点，特别是在儿童文学中诗歌韵律的再现问题尤为重要。在儿童早期的阅读中，韵律和节奏会给他们带来较为强烈的审美体验。赵元任先生精通乐理，同时又受到西方文化与五四时期新诗体改革的影响。在其诗歌英译中，可以看到自由体诗歌的形式，也可以看到其对于原作音乐性的再现。赵元任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诗歌的翻译问题集中反映在他的《译者序》中：

这书里有十来首“打油诗”，这些东西译成散文自然不好玩，译成文体诗词更不成问题，所以现在就拿他来做语体诗式试验的机会，并且好试试双字韵法，我说“诗式试验，”不说“诗的试验，”这是因为这书里的都是滑稽诗，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文的意味，我也本不长于诗文，所以只算诗式的试验。（赵元任，1922）

“滑稽诗”是相较于成人文学中的诗词而言的，儿童的认知水平有限，所以其诗歌往往较为浅显易懂，充满童趣。在翻译儿童的诗歌时，需要译者保持译语的节奏与韵律，试看下例：

例 3：

Beautiful Soup,
So rich and green,
Waiting in a hot tureen!
Who for such dainties would not stoop?
Soup of evening, beautiful soup!
Soup of evening, beautiful soup!
Beau ... ootiful Soo - oop!
Beau ... ootiful Soo - oop!
Soo--oop of the e--e--evening,
Beautiful, beautiful Soup! (Carroll, 1901)
体面汤，浓又黄，
盛在锅里不会凉！
说什么山珍海味，哪有这么样儿香。
半夜起来喝汤，体面汤！
半夜起来喝汤，体面汤！

涕溢糜饘汤！

涕溢糜饘汤！

半夜起来喝面汤。体面汤！

涕漓涂卤汤！（赵元任，1922）

赵元任（2009）在《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中指出：“有一个极要紧而常常被忽略过的幅度就是语言的音调方面。要是翻译诗歌的时候，那么节奏跟押韵尤其要紧”。上例中，译语保持了“ang”的尾韵，一韵到底，富于节奏。Beau... ootiful Soo--oop! 一句是故事中的素甲鱼在将单词中的元音拖长，作为音乐家的赵元任巧妙地利用了零声母“y”，将“体面”的音“tǐ mi àn”分为“tǐ yǐ mǐ y àn”。中国的儿童读者读起来也会像源语的儿童一样，将“tǐ mi àn”二字的声音拖长；且“涕溢糜饘”四字并非随意选择，“涕溢”出自南北朝的沈约《赠刘南郡委连诗》中的“离役代有。兴言涕溢”，涕溢即“眼泪溢出”。故事中的素甲鱼在唱这首歌时是“呜呜咽咽”（in a voice sometimes choked with sobs）的，可见“涕溢”一词不仅再现了韵律感，还再现了内涵。“糜”为“粥”，“饘”为“饱”，孩童读到这里便会自然联想到吃。从整首译诗的结构来看，赵元任的翻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新诗”特点。胡适（1919）在《谈新诗》一文中说：“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所以诗体的变革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反叛色彩，该时期诗体的特点表现为白描，语言较为简单。如胡适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想的传入，知识分子们带着“开启民智”的政治使命进行文化与翻译工作。在诗体变革和白话文运动最为激烈之时，赵元任开始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从其语言学家的身份来说，此次翻译活动带有文字改革试验的精神；从其音乐家的身份来说，在此次翻译活动中他凭借音乐素养再现了语言的韵律与音乐性；从其译者的身份来说，他心怀儿童，具有“儿童本位”的儿童翻译观，其语言充满童真童趣。这三点也是儿童文学译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即敏锐的语言及文体意识、诗化的节奏韵律意识和儿童本位的翻译观。

（三）赞助者——商务印书馆

勒菲弗尔（2003）将描述性翻译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他认为，“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员出于诗学的考虑会对源文本进行改写，而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patronage）则会更加关心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对翻译改写起阻碍或促进作用，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主包括个人、团体、出版商和媒体”。儿童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极易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Tomson-Wohlgemuth 发现东德书市上的翻译书籍绝大部分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这样的书符合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最容易通过出版审查。但在五四时期，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与国家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缺失，出版社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商务印书馆创办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多个文学刊物，是当时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广的书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该馆陷入传统与保守的风波。后其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逐渐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中心。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弘扬新文化的主要阵地也体现出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支配作用，它为适应时局不断引进新思想、译介新文化，《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乘此契机在该书馆成功出版。同样，正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正规性与先进性，保证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纸张与印刷质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能凭借该书馆的文化辐射力得到广泛传播。1922 年《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首版发行之后，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共再版了 17 次之多，足见译本与书局的影响力。

“丰富的字形、字体、排版和图像等语相突出手段实现文体效果是儿童文学的一大特质，是翻译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徐德荣、姜泽珣，2017）在插图的选用与书籍的排版方面，商务印书馆充分表现出了对译者的尊重。考虑到赵元任当时的留学背景，笔者选用做对比的英文版为 1901 年美国波士顿 Dewolfe Fiske & Company 的版本，在原书中，John Tenniel 绘有 42 张充满童趣的插图。1922 年 1 月，《阿丽思梦游奇境记》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根据当时书籍装订的一般情况，此书呈繁体竖排版，难得的是译本中保留了原书中的插图，这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值得称赞。周作人（2018）就曾表示，但插画一事，仍是为难。现今中国画报上的插画，几乎没有一张过得去的。同时，他对赵元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赞不绝口：“他

的纯白话的翻译，注音字母的实用，原本图画的选择，都足以表现忠实于他的工作的态度”。（转引自秦弓，2004）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儿童处在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转换阶段，但是仍以具象思维为主，所以“图文并茂”的书籍更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除了保留原作的插图之外，此书的排版情况也匠心独具。如原书中的 Mouse 在讲述自己“long and sad tale”时，赵元任将其译为了“尾曲的故事”。“tale”也涉及双关，它与“tail”为同音异形词（homophone），所以为尽力传达原文的风格，他在排版上也按照原文本的形式展现故事的“曲”与尾巴的“曲”，这种形象化而又新奇的排版方式会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给他们带来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同时在语相方面实现了风格再造。

结语

通过对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看出这部作品的成功译介与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译者的多重身份及赞助者的正向推介密不可分。在白话文、新诗体与“儿童的发现”等新观念在中国传播地轰轰烈烈之时，赵元任开始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同时，赵元任拥有敏锐的语言及语体意识，精通音律而又心怀儿童，所以这部译介的童书语言极具韵律且充满童趣。另外，权威的出版机构、出版机构对译者的尊重、原书插图及排版风格的再现也助推了这部作品的成功译介。这让当下的儿童文学译介不禁反思：在当下的时代中如何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如何再现充满童趣的巧译？较之于五四时期，笔者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译介情况呈现“两变一不变”的态势：实然变的是时代，当下时代信息交流的速度加快、程度加深，各国文化呈现交融之势；实然变的是译者与赞助者等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应变的是儿童文学译者个人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文体意识与“儿童本位”的翻译观，也正是这一不变量对儿童文学翻译的质量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Carroll, 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M]. Boston: Dewolfe Fiske & Company, 1901.
- [2] 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 Oldham: Steve Fieldhouse, 2009.
- [3] Lefevere, A and Bassnett, 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 Book[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6]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12.

[7] 胡荣. 白话的实验与趣味的变异——论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文学史意义[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6):101-109+142.

[8] 胡适. 谈新诗[N]. 星期评论, 1919-10-10.

[9] 胡适. 2000. 尝试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李宏顺. 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及展望[J]. 外国语, 2014(05):64-72.

[11] 李文娜, 朱健平. 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02):80-87+97.

[12] 林克难. 翻译研究: 从规范走向描写[J]. 中国翻译, 2001(06):43-45.

[13] 秦弓. 2004. 五四时间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04):114-118+144.

[14] 徐德荣. 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 中国翻译, 2004(06):35-38.

[15] 徐德荣, 姜泽珣. 2018. 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新思路[J]. 中国翻译 39(01):97-103.

[16] 徐德荣, 江建利.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2):98-104.

[17] 杨步伟. 一个女人的自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242.

[18] 应承霏. 近30年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现状与趋势[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03):119-127.

[19] 赵如兰. 素描式的自传[N]. 陈毓贤, 荣鸿, 译. 文汇报, 2014-11-21.

[20] 赵元任.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2: 11.

[21] 赵元任. 从家乡到美国: 赵元任早年回忆[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121.

[22]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A]. 罗新璋, 陈应年. 翻译论集(修订本)[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736.

[23] 钟毅, 郑凌茜, 宋维. 双重身份下译者的翻译活动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17.

[24] 周作人. 儿童文学小论[M]. 北京: 明天远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

A Translation Study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in the Descriptive Paradigm

An Shuang

Abstract: The trend toward the cultural turn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as gradually revealed in the 1970s, and descriptive paradig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al normative paradigm. Based on the descriptive paradig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from three levels,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ponso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pe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triple identity of Zhao Yuanren as a linguist, a musician and a translator with views on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Commercial Press formed a powerful impetus to promote the successful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Key words: descriptive paradigm;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ranslator's identities; sponsors